

社交与教化：上海市民与戏剧文化

曾 澜

近代上海戏剧文化从审美趣味、观演空间到传播媒介都呈现出与市民阶层的密切关联,经历了从社交到教化的功能转型。上海市民戏剧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既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更是近代戏剧艺术自觉和文化自醒的表征。

近代上海戏剧文化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和上海娱乐空间的商业化建构而迅速丰富和繁荣起来的。晚清以来,南北各地的众多剧种和戏剧表演人才纷纷涌入上海,上海剧坛囊括了昆曲、京剧、越剧、淮剧、粤剧、绍剧、锡剧、扬剧,以及评弹、滑稽等等十几个剧种,各剧种之间既相互竞争,呈现出不同的唱腔流派和表现形态,又兼收并蓄、融合创新,形成独特的海派特征。戏曲活跃的同时也带来观演场所的兴盛,“京剧风行,茶园斯盛”(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戏剧月刊》1928年9月第1卷第1期)。据统计,从1867年京剧入沪至1911年,上海正式的营业性戏园有120家,造就了“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中报》1872年7月9日)的剧坛盛况。上海成为近现代戏曲活动在南方的中心,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一说。

戏剧文化在近代上海的中心地位不仅表现在戏剧演出市场的活跃,更体现在戏剧文化空间的市民化转型,这种转型以戏剧功能从社交到教化的转变为显著表征。

戏剧审美趣味的转向

近代上海市民这一阶层的崛起亦是上海戏剧审美情趣由雅趋俗的过程。清代上海盛行昆曲,“沪上昔日盛行昆曲,大章、大雅、鸿福、集秀尤为著名。鸿福班中之荣桂、集秀班中之三多,俱称领袖”([清]王韬:《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31页)。昆曲是文人雅趣的典范。清末民初,市民逐渐代替文人士大夫成为近代上海戏剧文化消费的主体,热闹喧嚣、喜乐快感、滑稽夸张式的娱乐偏好使得他们对昆曲精微细腻的水磨调、风雅绮丽的文辞以及“雅致”的美学取向敬而远之。代表文人士

大夫趣味的昆曲与市民趣味渐行渐远,在上海剧坛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再受到近代戏剧市场的青睐。

与昆曲没落相反的,则是京剧在上海梨园中的盛世辉煌。同治六年(1867),京剧正式南下上海,在英籍华人罗逸卿建造的“满庭芳”戏园登台演出,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极大青睐。据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多以看京剧为时尚。至光绪初年,京剧已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观众最多的剧种。为京剧专设的戏园、茶园等娱乐空间也竞相开放,戏曲从宫廷和达官贵人的私宅迅速走向了普通的市民大众。此后,京剧取代了昆曲,成为上海剧坛转型的方向标。

京剧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剧坛独领风骚,是因为京剧出自民间,继承的是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更能适应清末民初戏剧舞台大众化、通俗化的趣味需求。相较于昆曲“语言曲调与今异”,“使人生厌”,皮黄和梆子

这些剧种“人皆能知之,故遂意感人”(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载《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9月第1卷第1期)。京剧的唱词运用了民间叙事文学的文体,并辅之以相匹配的板腔体及伴奏乐器,营造出豪放而热烈的气氛,造成文场刚烈、武场喧闹的演唱场景。在形式上,京剧凸显曲折离奇的情节,并配以极尽奇幻巧妙的机关布景,追求时尚新潮的戏装;内容上则配合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编演时装京剧,将市民命运和时事生活编入剧目,如《宋教仁遇刺》《枪毙阎瑞生》等。这些改良使得京剧呈现出浓厚的市民气息,迎合了当时上海戏剧消费市场追新求异、戏剧场面景观化的市民审美趋向。一些比京剧更具草根性的地方剧种如沪剧、淮剧等纷纷效仿京剧,迎合这股市民化的审美风向,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戏剧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昆曲的式微和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剧种的梨园盛世,意味着近代以来文人士大

夫美学趣味一统天下的文化秩序的解体,而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剧种渐次开始了向市民文化身份的转型。

“新舞台”：从社交到教化

戏剧改良运动推展了上海戏剧文化空间的功能转型,下面以新式剧场和戏剧报刊二例简要介绍。

上海新式剧场出现之前,戏剧的观演空间主要是茶园。茶园由戏园更名而来,其饮茶看戏的观演模式沿袭了中国“宴乐观剧”的传统习俗。茶园内设有专门的三面观敞口式戏台,虽与观众区相隔隔离,但观演空间并没有明晰的边界。演唱空间被观看空间三面包围,不仅戏台前方的廊柱阻碍了部分观看者的视线,而且观看者

(下转15版) ➡

➡ (上接13版)

论题可以见于《理想国》开篇的智者“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的主张,或《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所谓强者应当统治的论调。柏拉图《会饮篇》提出的“亚西比德问题”,则完全贯穿于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前后。可以说,对比讨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总是开启无限的思想空间。

事实上,对比讨论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常见于许多政治哲学著作,这里权且列举格雷纳(David Grene)《古希腊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所呈现的人》(*Greek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1965)。修昔底德以极为现实的笔调呈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准确说呈现了处于希腊史上最重大战争中的雅典与雅典人;相比之下,柏拉图几乎只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尾声,但令人惊异的是,柏拉图对话几乎只是对自己前28年所经历的雅典的“回忆”,这在时间

范围上就与修昔底德高度重合。格雷纳这部书即从二人两种不同纬度入手,去呈现那个曾经的雅典,那个最为政治的政治世界,从中考察人之为人、人与政治的问题,极富启发意义。

近代而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霍布斯与修昔底德。霍布斯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前有一个著名的“致读者”,当中他举修昔底德为历史写作的最好代表,正如荷马之于史诗,亚里士多德之于哲学,德谟斯提尼之于演讲;并且重述修昔底德认为,历史之教就在于取知识于过去,持审慎于当下,有远见于未来;当然还有如前文讨论写作方式时所说,霍布斯首先指出修昔底德史书是一种“现场教育”。最深的影响痕迹,则莫过于《利维坦》中说,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源于;利益竞争、安全恐惧与荣誉追求——这三种原因的列举直接借于修昔底德的书。对于霍布斯与修昔底德的思想关系,我们可以很好地参考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1996;有中文版),尤其“第六章 历史”。

关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德,素来令人怀疑二者更有直接关联,因为观感上二者太相近了,现已有学者考察证明,马基雅维利关于历史的观念受惠于修昔底德,并有直接的文本承袭可以为证。但,虽然如此,二者却不能等同,同为“现实主义”却有重要的差别,这方面就笔者所见有两篇论文值得推荐:1、福德(Steven Forde)《现实主义的多种样态——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Varieties of Realism: 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4, No. 2, May, 1992); 2、帕尔默(Michael Palmer)《德性之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德的差异——修昔底德的传统德性与政治智慧》(“Machiavellian virtue and Thucydidean arete: Tranditional Virtue and Political Wisdom in Thucydide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1, No. 3, Summer, 1989)。

补充与结语

以上分门别派式的文献举要,好处是快速了解大致门径,坏处是易陷于某种学派“家法”,使用者还当以博通为要。

另外,举要就难免遗漏,笔者必定也有武断。作为小小补救,最后不妨再加几种研究手册或综述式文集,以有助于通览全貌。1、前后相继、跨度近乎80年的两本文集,选编相应时期的优秀论文:赫特(Hans Herter)编《研究之路第九十八辑:修昔底德》(*Wege der Forschung Band XCVIII: Thukydidies*, 1968),收集的是1930—1965年德语学界的论文;瑞伽科斯(Antonios Rengakos)与人合编的《布里尔研究指南——修昔底德卷》(*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2006),择优收录1966—2006年期间论文;2、克里斯蒂娜·李(Christine Lee)与人合编的《研

究手册——后世对修昔底德的接受》(*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2015); 3、巴洛特(Ryan K. Balot)等三人合编《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德卷》(*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2017)。此外还有数种,兹不尽举。

这篇小文,虽为区区举要,零敲碎打竟也耗费多日,除却愚钝不计,也想借此大致清理所知文献,或于同行者不无助益。其中错漏当所难免,尚求方家斧正。

通读修昔底德委实不易,深入研究则更为繁难,但努力之后的收获必定是巨大的,霍布斯推修昔底德为史学第一人,后世史家巨擘如麦考莱、兰克等人更是异口同声,认为两千年之下没有第二人,更何况修昔底德兼具卓越国际政治眼光,与深刻政治哲学洞见,能契合于任何重要国际政治时代尤其当今时代,如果竟然错过,还有什么更大的遗憾呢?(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